

喧哗与骚动的中国经济 中国新一轮改革大幕已经拉开

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第二次转型”
谁该摘取中国经济成长的果实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



why reform is so difficult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杨英杰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why reform is so difficult



杨英杰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杨英杰著. —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35-5132-1

I. 改… II. 杨… III. 中国经济—研究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5268 号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策划统筹 王 君

责任编辑 蔡锐华 甘 璐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王明明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季峰印刷厂

字 数 36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625

定 价 53.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第一篇 保尔·柯察金的困惑与产权制度

保尔·柯察金的困惑与产权制度	3
“官位”之产权属性分析	7
本·拉登与产权市场	11
高尔夫球之争与知识产权意识	14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尊重知识鼓励创新	17
选择权也是财富之泉	19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	23
从交易费用看经济发育	26
公园晨练冲突中的经济学含义	29
民营消防队为何“见火不救”	32
权利的证明与财富的增进	35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39
官民比例与人民币币值	42
高经济增长率下的低教育回报率之谜	45
人才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	48
创新型国家不仅仅是科技创新	51
人力资本预期收益下降是内需不足的主要诱因	54

第二篇 谁该摘取中国经济成长的果实

- 谁该摘取中国经济成长的果实 | 59
- 中国人在为这个世界供应午餐 | 62
- 期待工资引领新型增长模式 | 65
- 外资对于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 | 68
- 出口对于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 | 72
- 出口导向型经济还能带来什么 | 75
- 让国内资本更多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 78
- 追求外贸平衡不是我国经济首要任务 | 81
- 警惕“荷兰病”魔咒袭扰中国经济肌体 | 84
- 汇改攻坚箭在弦上 | 87
- 以什么“内热”抵御“外冷” | 90

第三篇 和谐社会核心是什么

- 和谐社会核心是什么 | 95
- 缓解收入不平等关键是降低贫困 | 102
- 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 | 106
- 收入差距拉大是全球性问题 | 109
- 富士康事件的含义：必须支付的工业化成本 | 112
- 构建和谐社会 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 115
- 建设新农村不能脱离城市化进程 | 119
- 薛宝钗的和谐观 | 122
-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之最终目的 | 125
- 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第二次转型” | 128
- 分配制度改革：新一轮改革的切入点 | 131
- 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 135
- 财政政策应关注提升消费性需求 | 138

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不是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	141
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包容性增长	145
重视解决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冲突	148
“占领华尔街”反映资本主义内生危机吗	152
文化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155

第四篇 别把希望都寄托在股市上

别把希望都寄托在股市上	161
自主创新绕不过股市这道坎	164
居民敢不敢消费投资与金融市场改革有关	167
中国资产价格：泡沫多大才危险	170
中国股市上涨对拉动消费作用不大	173
资本市场变化挑战中国政府调控能力	176
资本自由流动的自由度该有多大	180
增加就业还需加速推进资本深化	183
股市问题全该由政府来“扛”吗	186
继续强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	189
谨防流动性过剩变为流动性危机	192
稳物价和保增长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	195
防范金融风险必须两手抓	199
中国有信心维护金融稳定	202
保持经济增长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基础	205
巨额信贷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208

第五篇 中国宏观调控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宏观调控的出路在哪里	213
解决中国关键问题唯有依靠民间力量	217

对我国近期物价走势的判断	222
政府全面退出要素市场应成为改革主攻方向	228
远离重商主义是我们现实的选择	232
“索罗诅咒”与中国经济增长	235
政府支出转向是当前紧迫问题	238
投资低效是危害经济的祸首	242
我们更看重发展的效益和质量	245
历次投资过度引发经济过热都与央行独立性缺失有关	247
转变需求结构是当务之急	250
中国农业出路何在：城市化与工业化需求驱动	253
咸鸭蛋、多宝鱼与“看得见的手”	256
运用市场机制解决当前经济突出问题	259
有效运用金融手段搞好宏观调控	262
自主创新为何要强调需求导向	265
从紧货币政策面临刚性约束	268
把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	272
中国经济在“两难”中前行	275
两难中的货币政策	278
“收紧银根”能抑制物价上涨吗	281
宏观调控欲往何方	284
坚持宏观调控基本取向不变	287
以市场之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90

第六篇 未来三十年发展的指向：制度与理念并举

未来 30 年发展的指向：制度与理念并举	295
制度建设为中国经济释放潜力	299
下一步改革模式应转变成：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型	302
中国经济发展亟待摆脱凯恩斯主义思想的羁绊	305

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优势和长期优势	312
中国经济如何突围：松绑加放手	315
重要历史关口期盼中国农村“二次革命”	318
下一个 30 年的三大挑战	321
下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326
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和活力源泉	329
政府投资的重点应在哪里	332
当前我们更需要熊彼特	334
中国经济亟待解锁	337
跨过经济结构调整这一关	340
从体制上解决产能过剩的深层次问题	343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	346
高储蓄率还会那么重要吗	350
重视反危机中经济增长的代价	353
“后危机”背景下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	357
转变发展方式须首先转变发展思想	361
抓住机遇全面启动民间投资	365
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368
科技发展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371
中小企业不只缺“钱”	374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转型创新	377
中国经济发展亟待突破“锁定”状态	380
“围魏救赵”走出中国经济困境	385
中国经济不转型难以为继	388
中国新一轮改革大幕已经拉开	391
后 记	394

1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第一篇

《《《 保尔·柯察金的困惑与产权制度

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一个情节，时任仓库保管员的保尔疑惑而又愤怒地对其他几个共青团员说：“以前我们在为资本家干活时，既没有人迟到又没有人早退，更没有偷盗现象；为什么我们翻身做主人了，在为自己干活了，却又迟到又早退，甚至又偷又抢呢？”保尔虽然困惑，但他心中显然是有一个答案的，那就是这些人忘记了苏联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忘记了远大的理想和信念。这方面的原因是有的，但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人性本无善恶，环境不同而已。同一个人，一种环境下规规矩矩、拼命工作，一种环境下迟到早退、又偷又抢。我们不能说他本性就是时好时坏，而只能说是环境使然。动物的投机主义在人身上同样很显著，这种投机主义表现为对环境的主动积极的适应，不论这种环境是经主观改造过的也好，保持原始状态的也好，这种适应最终体现为每个人在对其来说是既定的外在的环境中实现收益最大化。既定环境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一定的制度。制度的设定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不同力量竞争的结果；一种是权威依据一定的理论或（和）经验直接制定的结果。表现于人类经济交往中，就出现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不同的体系。在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中，经济主体的形成也就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在市场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栉风沐雨发芽成长开花结果，一种是在计划的安排下互不干扰地在暖房中长大。一旦将计划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经济主体移栽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缺乏对市场竞争的

免疫力而很容易失去成长的活力。有两种办法来对市场竞争进行抗争，一种是依靠权威的力量对经济主体进行保护，可以特许其不按市场经济下的竞争规则行事；一种是对经济主体产权形式进行重新安排，逐渐形成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运作方式。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的方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股份制应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尽管有些人以反对“一股就灵”的名义对股份制提出责难，但他们却无法否认对一定规模企业来说“无股不灵”的判断。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要建立市场经济，经济主体的产权就必须清晰，可以说，没有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如果仍是那种人人拥有却人人不负责的产权制度，那么这种产权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伪”市场经济。这种产权制度下的经济主体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进而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则是必然的。

以我们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一方面为了化解金融风险、最大限度地收回、变现不良贷款，另一方面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务院分别于1999年4月和1999年10月成立了四家直属国务院的国有独资金融机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将1.4万亿不良资产从银行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一再强调，这次剥离是“最后的晚餐”，各商业银行要以此为新的起点，轻装上阵，不能再重蹈覆辙。然而，仅仅过了四年的时间，这四大银行又积累了2万亿的不良贷款。如何处理这些不良资产，是目前争论的焦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将这些不良资产进行第二次剥离，交予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使国有银行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削弱它们进行改革的动力，不利于良好公司治理的建立。因此我们认为，降低不良贷款的重任应责无旁贷地落在国有银行自己身上。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短短四年间又积累了如此之高的金融风险呢？

从信贷风险管理制度的形式上看，国内银行与海外银行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一个类似的制度在不同的国家运作下来，为什么就会南橘北枳呢？一个最为关键的制度性因素在作祟。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缺乏清晰的权力责任制度和激励约束制度，特别是在贷款出现问题时缺乏明确的责任制度。所谓权力责任制度的缺陷，指的是贷款缺陷的分布完全根据行政级别而不是风险管理能力来划分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缺陷，则表现在激励不足上。如此一来，约束过度时，信贷人员就会选择消极怠工，激励过分而约束不足时，则容易让信贷人员铤而走险。同时，发放出去的贷款在出现问题时，往往通过所谓信贷委员会的集体负责制度等，人人负责的同时又人人不负责，使得责任的追究无从着手。根本原因还在于产权不明晰，与非金融国有企业的病根一样。有了明晰的产权，才能建立起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从而不仅保证银行作为企业的经营效率，也保证了金融业监管有了良好的微观基础。中国的银行最现实的问题在于首先产权就是不清晰的，没有清晰的产权为基础，外部监管无法从根本上防范、控制银行风险。这就是我国金融体系脆弱、金融风险加剧的根本原因。

我们再回到保尔的困惑。我们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在一些人心中这种困惑或许仍然存在。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其中肯定会遇到困难、挫折甚至风险。应对这些困难、挫折和风险，需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同时，又要深刻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吸收人类社会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经营方式、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对于企业来说，不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健全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最为重要，这种机制不仅仅对企业员工，更重要的是对企业的管理者。然而，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同样需要激励机制，说到底，根子还在于产权制度。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人们也就不存在去积极建立监督约束和激励制度的动力；即使是建立了某种激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励约束制度，人们也缺乏实施这种制度的动力，最后归于纸上谈兵。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中，合理明晰的产权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合理明晰的产权制度是万万不能的。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 年第 2 期）

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格由供给者和需求者双方共同决定。当两个或更多的个人都想获得更多的同一种商品时，就会发生竞争。竞争所引发的冲突必然要用某种方式解决。决定胜利者的标准就是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供给者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将把商品出售给出价最高的购买者。当然，交易的媒介或中介物必须是由习俗所认可或法律所规定的一般等价物。

价格的发现或生成是需要成本的。市场经济中，发现价格的过程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左右；计划经济中，价格由中央集权的代表来发现（如果这也可以被称作“发现”的话）。制度运作的成本或交易成本无论在市场经济还是在计划经济中，都是存在的，因为信息是稀缺资源。理论和实践已经向我们证明，较之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中的交易成本是巨大的，有时大到交易无法进行，制度无法运转，这是不同经济制度框架中经济绩效何以相差悬殊的根本原因。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市场经济的优势和效率将越来越明显，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制度背景之趋势已是不可逆转。

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向选民提供市场不愿意承担的公共物品。这个职能由政府官员来执行。我们的问题是，政府官员的“官位”怎样确定才能使之发挥最大效能。我们可以将“官位”作为某种性质的经济物品来看待。“官位”之所以可以被看成是经济物品，原因是其稀缺性。我们再把它看作是可以交易的，即当作某种商品。某一经济物品若想成为商品，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存在商品的供给者，二是存在商品的需求

者，三是存在能使商品供给者和需求者交易的市场。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官位”这一商品之所以有需求者，与一般商品一样，在于它的有用性。它能提供社会地位、满足虚荣心、实现自我价值以及一定的经济收益等。

再谈“官位”这一商品的供给者，理论而言，“官位”是为提供公共产品而设的，因此它的供给应由公共产品的需求者提供。民主社会中，“官位”由选民来提供。选民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官位”的多少，这一过程通过民主选举来进行。而专制社会中，“官位”则由专制者提供。专制者提供“官位”并不意味着公共产品只为专制者所享用，若果真如此，公共产品也就不能称其为公共产品了。专制者之所以提供“官位”，是因为专制者以其治下的广大百姓的利益的代表者自居，而这种权力的行使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其后盾。当然，民主社会中，也并不是所有的“官位”都由选民市场来决定，因为这样会加大交易成本，使其边际收益低于其边际成本。选民只需提供较高阶层的“官位”即可，较低阶层的“官位”可由较高阶层的“官位”来决定，这一过程类似科斯所揭示的企业出现的过程，企业的出现在于以交易成本较低的合约代替交易成本较高的合约（张五常的观点）。“官位”这一商品的交易市场，民主制度下存在于各种新闻媒体如电视中、报纸上、电台中，专制制度下交易的场所则在专制者的家中或办公室内。

若想使商品提供其最大的效益，发挥其最大的效用，即，为保证这一商品最终落到出价最高者的手中，必须明晰其产权。我们的世界既不存在纯粹的私有产权，也不存在纯粹的公有产权，而是两者不同程度的混合。“官位”这一商品的产权便具有这种混合的性质。一般来说，产权可以分为两个要素：使用权和控制权，后者又包括收益权和转让权。纯粹的私有产权是指，专有的使用权和专有的收益权，以及自由的转让权（见张五常《经济解释》）。纯粹的公有产权是指，公有的使用权和公有的收益权，转让权则不存在。社会中，习惯和法律的存在使私有产权的专有使用权和专有收益权并不完整，会打些折扣。比如这辆汽车是你的私有财产，但你不能随意将它烧毁，简单来说，烧毁至少会污染空气。你有随意处置这辆汽车的权利，但你没有污染空气的权利。公共草

地可以认为具有公有产权的属性，任何人都可以在此放牧，直到因为草被吃没了或过度拥挤带来的成本较高而无法放牧为止。

同理，若想使“官位”这一商品提供其最大效益，也需要明晰其产权。我们这里作以分析。“官位”这一商品的产权属性类似于公有制企业的产权属性。就“官位”的使用权而言，应属于占有此位的官员。这里的使用权主要包含习俗、公意、法律赋予“官位”的职权。就“官位”的收益权而言，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产生如社会地位、满足虚荣心、实现自我价值以及一定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属于执行“官位”职权的官员；还有一部分是用来服务社会而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这部分属于广大选民。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可以说“官位”收益权的两部分之间存在着交易，即属于广大选民的社会收益与属于执行“官位”职权的官员个人收益之间的交易。一方是由选民掌握的“官位”产生的个人收益，一方是由行使“官位”职权而带来的社会收益，这两者之间产生交换。理论上来说，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种交易对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若存在不公或欺诈，交易就无法实现。但就现实而言，不存在完全的公平，这种不公平的程度依社会的民主进程如何而定。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就越快，交易的透明度就越高，交易中的不公或欺诈就越少，即使存在不公或欺诈，较低的退出成本也能使交易者迅速改变策略。就“官位”的转让权来说，应属于全体选民（当然，这是就更为广泛的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的，而不是就每一个具体的“官位”而言的）。如果“官位”的转让权仅属于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甚至是属于某些个人，就会出现“官位”的私人成本与其社会成本之间的不对称，也就是所谓的腐败。企业在获得收益的同时污染了环境而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来制约，就会出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对称；官员在获得个人收益的同时让社会承担了他本应该承担的大部分成本，也会出现另一种不对称，这是另一种“污染”——腐败。

前面已经说过，“官位”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如果在位的官员将“官位”的使用权主要用来提供私人产品，那么，在公平交易情况下，选民将使用其“官位”转让权去选择能为选民带来公平交易的交易者。